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二十四） ·

AI 技术社会中的技术物问题

邹诗鹏

【内容摘要】 不同于机械时代技术物的“座架”性质，当今 AI 技术社会的技术物日益呈现出社会整体智能化与系统化的特征。AI 化成为社会生活及其组织运作的前提，而 AI 技术物及其与世界的连通，也越来越呈现为“管道”形式。AI 作为技术物，逐渐被赋予社会存在与生存论意涵。西蒙东基于电子管技术设定了技术物的两重规定：不确定性与技术个体化。但在 AI 技术社会中，AI 作为技术物越来越需要与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确定性相关联，技术个体化也不应被滥用，有理由规避各种打着奇异化旗号的社会离散现象。AI 作为技术物，意味着劳动可替代性的增强，因此应更本质地理解劳动与 AI 的关系，劳资关系仍是理解 AI 技术物的前提。AI 技术社会的关键问题，还是 AI 逐步替代人类活动时，如何理解与认同 AI 社会，以及如何运用和保护人类的知识创造能力。

【关键词】 技术社会 人工智能 技术物 人类活动

【作者】 邹诗鹏，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埃吕尔提出了“技术社会”概念，^①以描述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之后不久，西蒙东提出“技术物”概念，^②其受到个体化的影响，把技术物视为肯定性的存在物，并以不可知论及其不确定性来定义技术物，但他所说的技术物实是排斥社会关系的技术个体物，而且基于当时的电子技术状况，西蒙东的技术物还难以表达今日 AI 技术时代的技术物。此后，斯蒂格勒进一步将技术物的讨论引入某种“无共同体的共同体”语境。^③与此相关，鲍德里亚、卡斯特提出网络虚拟社会何以就是真实的现实世界，^④技术物获得了新的理解。拉图尔则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把握在地性的社会生活，侧重于人类面对网络世界的活动及其生活，基于拉图尔的理论，智能机器人有理由成为社会中的一员。本文讨论的是不断变化的 AI 技术对当下技术社会的影响与塑造，分析 AI 技术社会的技术物状况。本文会涉及对相关资源尤其是西蒙东技术物概念的分析，但主要还是分析 AI 技术社会中的技术物问题。



—

不能将一切社会都看成是技术社会，技术社会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在社会关系上，现代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社会，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在物质-存在意义上，马克思所肯定的现代社会正是工业社会。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⑤“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⑥工业的技术标志即机械。在现代性框架中，机械与人并不矛盾，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把人与机器等同起来，意味着机器或机械乃是人的对象性能力的直观体现。不过，在近代技术条件下，称之为机械或机器的技术物，还只是作为人的工具，是人之延长，其技术功用完全被规定在人的福祉之内。近代以来的观念依然延续了技艺传统。实际上，不同文明传统，都有一种以人文限定技术滥用的倾向，而且都将技术置于文化系统的最低或较低的位置。在诸多文化传统中，技术只是构成社会系统的一种元素，而不是主导因素，因此传统社会不是技术社会。

但技术本身在飞速发展，且其发展超越了人文传统的演进。海德格尔把技术看成“现代人的天命”，此天命观与其“此在之在世”（Dasein:In-der-Welt-sein）的生存观相通。但海德格尔道出的依旧是技术-世界，而非技术社会。社会与人不在其哲学论域中。自埃吕尔推出《技术社会》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社会概念逐渐流行起来。一般而言，技术社会是自动化技术以及控制论的产物，而核技术的出现以及核威慑则是强大的倒逼因素，促使技术社会概念带有反思性或自反性特征，概因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使得机械技术大规模改变和摧毁社会得以可能，也使社会中人普遍感到受制于技术的急迫。今天，无论是否有必要区分机械技术与信息技术，技术社会概念都是讨论AI技术社会的反思性的前提。

如今，技术社会本质上已不再限于传统在地性的人与人社会关系及其市民社会，而是指AI高度嵌入社会状态下社会整体的技术化与系统化，是智能化社会。技术社会的本质越来越由AI所规定，当代技术社会正全面趋向智能化。在AI化的技术社会中，虚拟（网络化）与在地性高度关联，且在地性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空间。通过网络化与网络社会，成就智能化社会。智能化社会弥漫着高度的人机互动，人越来越依赖AI，技术地生活规定着人的社会生活，AI化成为社会生活及其组织的前提。

AI技术社会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人与作为技术物的AI关系所决定。人与人的交往，即使不是由人与AI的关系所代替，也是被AI所中介，且这一中介越来越强势，无孔不入。其在给人类带来福祉与便利的同时，也形成了控制与宰制，导致技术依赖无处不在。人被技术性地给予，从欲望、知识到思想，诸多环节，人的一切活动都处于AI之中，被AI所“管道化”，直到他只信任AI世界。在AI技术社会中，AI作为技术物越来越直接地塑造着技术社会，并予以之重构、控制整个社会世界。

二

传统时代的技术物主要是机械或机器，但同时也经历了从人对机器的支配到机器反过来支配人的转变。“在使用工具的时代，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技术的个体性；然而现在，机器取代了人的位置，它才是真正的工具携带者，而人所完成的只是机器的一个功能。”^⑦但人与智能机器

人的关系并不完全从属于这样一种转变，主要在于智能机器人具有某种拟人性，其作为技术物，同时也是技术人，正是这一点将人类劳动以及人类主体性推向前台。智能机器人有可能取代人的劳动，但即使在被机器支配的状况下，人也并非只是机器的一个功能，而是操控者，智能机器人既有可能视人为受动者，也有可能把人设定为主动者。

20世纪中叶出现的自动化到当今的智能化，经历了一种技术物的艰难转变。但自动化(automation)概念一直没有脱离机械语境。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自动化，主要是指在制造业中使用机械设备来替代人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机械概念，半自动化概念更是加重了机械的意涵。海德格尔的“座架”即有着一种本质的机械性质，对他而言，自动化是半自动化机械技术的升级，而不是技术物的实质变化，技术物在质料上的变化，超出了海德格尔的想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从机械化的自动化到控制论与信息论意义上的自动化的转变，^⑧但控制论与信息论在关联于机械技术方面是有别的，控制论还是机械技术在程序操纵上的运用，所谓自动控制专业不过是机械专业的延伸，自动化的设施，也有理由作为技术物的典型。信息论，作为生物信息以及微电子信号的科学，突破了机械技术及其座架性，在那里，技术物开始摆脱机械的质料特征，成就网络。通过鲍德里亚以及卡斯特等的努力，网络以自身方式连接并塑造社会，形成了物体系以及网络社会概念。

在西蒙东那里，自动化并不是一个肯定概念，西蒙东有意拉低自动化而从不确定性来界定技术物。不确定性使得技术物得以拓展其关联与延展网络，事实上是以不确定性代替自动化。“机器真正的完美性，我们可以说是技术性(technicité)程度的提高，它相应的并不是自动性的提高，而是相反，由一种不确定性范围(marge d'indétermination)来界定。”^⑨但是，不确定性并未通向技术社会，没有完成与技术社会的对接，西蒙东的技术物仍然飘浮于技术社会之外，“技术个化”(technological individualisation)是技术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前提。

西蒙东用技术个化因应于已在社会性方向扩散的自动化主义。“自动化主义，以及在工业上所谓的自动化，在经济以及社会上的显著性要比在技术上的高。”^⑩但是，今天，AI的自动化程度已远非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五极管为最高阶电子技术的自动化。^⑪彼时，自动化还作为机械力学概念，而西蒙东将自动化直接看成是工业化意义上的自动化，但当今时代的智能化已不再是机械力学概念，而是信息技术以及社会系统意义上的概念。智能化规定着所谓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本身也是自动化在遭遇信息化冲击之后的升级。

尽管如此，当人们以为用机器概念不能表达AI的社会功能时，须知所谓AI仍然不过是机器的一种。当AI失去能源支持时，其就是一堆无用的机械，而当AI处于失能或无能状态时，唯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方能解除困境。因此，AI作为技术物，只有置于技术社会结构，并与现实人类个体发生关联，并且有益于人类生存时，才具有存在性质，且本质上是社会存在与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性质。在人类本质规定上，AI机器人可能具有拟人的特征，但其本质上还是技术物，而不是技术人。

三

技术物的肯定意义来自其与人类进步的正向关系，但AI作为技术物的展开，并不直接形成社会整合与技术个化。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物告别了单一的机械模式，趋向于自然。“具体的技术物，即进化了的技术物，更接近自然物的存在模式。”^⑫技术层面讲解是如此，但置于技术社会宏观背景下，则非自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技术物的发展使其越来越远离人与世界的同一，人的生物学性质

越来越难以得到保存和发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类将自己的生物学个性赋予了技术组织：他们是工具的载体。”^⑬在此，技术乃是深渊般的物体系，^⑭其也技术化地塑造着技术世界及其生产交往方式，使生产与交往呈现出异化状态。西蒙东提出技术的社会性成年，以把握技术物对社会的定向。在他那里，“工匠以及工程师并不只是为自己而生存，他们是人类社会以及技术物世界之间关系的见证者和代理人。他们有特别的价值：通过他们，技术物被整合到文化中”。^⑮西蒙东进而提出“技术学家”概念，技术学家超越仅具功用及效用价值的工程师，具有整体性能力，能够打通技术与文化之间沟裂。这当然仍是某种理想设定。实际上，技术物与文化之间的沟裂与冲突在持续扩大。技术社会的需要，是将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士拉进课题、项目及师生职业共同体，而那些不被吸纳的人士，则选择“躺平”或者成为边缘者。智能时代这一现象在持续加剧，簇、部落以及圈子化的现象同样存在且更加明显，AI对智能文化的整合，尚需时日。

在西蒙东看来，技术物不可能被完全认识，技术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与人关联起来。^⑯“可能任何一种技术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直觉和本能系统 (coefficient)，后者对于在人与技术存在之间建立适当的交流是必需的。”^⑰这颇有技术有灵论的意味，似乎带有某种文化人类学的想象，但毋宁说是对技术社会中人的被(受)动性的承认。实际上，随着AI的大规模运用，人的主动活动越来越少，智能机器人技术带来的舒适，在使人享受技术时，也使人与先前的社会关系疏离，人与世界的关系仅限于人与技术物。在这种情形下，技术有灵论不仅促使人依赖于智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智能，更让人迷信自己在智能化管道系统中的自恃与自信。尤其是对那些生来即面对AI技术的人而言，单一的个体与技术物的关联方式本质般地给出了相应的生存方式，造就了越来越多“独特性的个体”(individual of singularity)，宅、管道化成为基本的生存样式，各种身份政治被巩固，非社会性的交往即是现实的生活世界。

“人通过技术摆脱了社会的束缚。通过信息技术，人成为这个曾经囚禁他的组织的创建者。”^⑱“社会的状态也相应改变，成为组织的对象，而不再只是被动地作为价值或斗争的既定现实的载体。”^⑲这是技术物的“积极”成果。人也通过技术实现社会支配，换句话说，技术成为社会支配的主要手段，成就了社会技术，以及从主动管理(组织)到被动管理(监控)的一切社会技术。技术的确实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技术促使社会关系连通起来。但是，就技术个化而言，技术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区隔，技术的齐一化使得人们难以真正接受如此区隔，因为技术首先改变了社会，即使得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难以确立。技术个化塑造的个体是技术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即技术塑造的个体，如同网络投喂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个体。技术个化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现实个体的个性化需要，而技术个化也必然走时尚化路线，但技术物的定制模式显然不能先天地被设定为积极的和开放性的，其为所有者承认，主要取决于所有者在既定技术管道中的认知与想象。

四

现代性状况下，劳动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体现，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也是通过劳动实现的。AI作为技术物，意味着劳动日益增长的可替代性。西蒙东已揭示劳动与技术物的倒置：“直到今天，技术物的现实已经成为人类劳动现实的背景。人类通过劳动来掌握技术物，视其为工具、辅助物或劳动产品。然而，我们必须能够进行逆转(这样也有利于人类自身)，让技术物中人的部分直接

出现,而无需通过劳动来呈现。我们应该视劳动为技术性的阶段,而不是把技术性当成劳动的阶段,因为技术性是总体,而劳动只是其中一部分。”^④这一理解摆脱了对劳动的受动性理解, AI时代有理由被替代的正是那些可重复的劳动。然而,吊诡的是,那些 AI时代能够被简化的琐碎劳作,并不因 AI的推广而减少,家庭主妇时常抱怨:家用 AI的引入使得家务活不减反增,以至于人反过来服务于家用 AI。在某种意义上,手工艺时代劳动者作为技术保存者与体验者的角色正在消失,转而成为 AI时代信息指令的执行者;然而,当人们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却又“无所事事”,但 AI时代的“无所事事”看上去总是被某项非工作性事情缠绕,比如深夜里不停地刷小视频,但本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空虚。

西蒙东在技术物的意义上所说的劳动,还是简单劳动(甚至是死劳动),现代性意义上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AI作为技术物,能够使人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其对人类劳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也是基于人类劳动的文明底线必须回应的挑战):AI是否能够代替人类的创造性劳动,从创造知识、创造文化到创造技术?技术物之所以不能代替劳动,在于劳动蕴含着更大的创造性与不确定性。西蒙东虽在一定意义上承认知识生产本身也是劳动的表现,但他所谓的劳动,主要还是物质劳动。但技术物或物体系,导致劳动表达的变化,还是与知识效用(技术性效用)关联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拥有技术知识时,这种知识需要在劳动中才能表达,而不能用智性来表达,拒绝劳动就等于是浪费了才能。相反,当技术性已成为可以抽象表达的知识,而不需要被实现时,这种表达的需求才不再和劳动挂钩。”^⑤劳动弱化的原因的确涉及知识生产与表达,但主要还是劳动与技术物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AI作为技术物,不仅要求我们把握劳动的不同方式,还要求我们更本质地理解劳动与 AI的关系,此关系不能外在于劳资关系。“资本的异化不是相对于劳动或与世界的接触(如在主奴辩证法中),而是相对于技术物。”^⑥“劳动力和资本落后于作为技术性的守护者的技术个体。”^⑦西蒙东通过否定劳资对立来强化技术物的存在性质,但技术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劳资对立。社会权力的基础是资本,当将其置于劳资关系之中时, AI作为技术物,必然要建构相应的社会关系。西蒙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提出抽象技术物与具体技术物的区分,但其又将具体技术物看成是实体性的存在,而忽视技术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抽掉社会关系来理解 AI,实际上是一种实体性思维。不仅 AI如此,即便是 AI的创造者,也只有在从属于资本关系时,才能展开现实的技术活动。AI时代过劳现象以及剥削现象仍在加剧。因此,撇开现实矛盾,将 AI技术物实体化,不利于理解其存在性质。

五

AI时代的机器,的确呈现出身体化的存在(“义具”的重新组合及其具身化),^⑧但是,在技术重置的社会世界里,其机器外壳与某种人化或类人化的行动方式是分离的:前者越来越弱化,并且代之以乏味十足、高度适应环境变化的智能化。如果 AI机器人与人类难以区分(具身智能从理论上突破了 AI机器人与人类的界限),在一般社会交往意义上, AI机器人也就被看成是人类。一旦智能机器人以某种方式获得人类的信任,形成社会甚至私人的关系,其与人类的界限也会消失。换句话说,人与技术物的实际的社会性区别也将消失,那种仅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人类社会结构的思维方式将归于失效。

这意味着 AI 作为技术物，不再是“技术物”，而就是“技术人”。技术人不再只是工具，也不再只是中介。AI 技术社会中，AI 机器人就是主体，其正是芸芸众生之技术人中的普通一员。与此同时，AI 世界里，技术物成为技术人，而现实的人与个体也可能成为“技术物”。现实的人类个体与技术人、技术物之间展开交换与交往。通常而言，因学习与模仿，技术人是整体意义上的人的代用品。但在技术人的世界中，器官学不再只是技术个体的组织学，而是人与技术人混合在一起的技术社会的组织学。而且，只要这种人类与技术人混合在一起的结构还是社会有机体，就必然要求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介入。事实上，AI 实践已在多个方面倒逼人类秩序，在那里，技术人类学将直接诉诸政治人类学。

技术人的世界，已然是一个后人类的世界。科幻艺术已对此有过太多的想象。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来自多个方面，但技术人的质疑前所未有的，因为其直接挑战人的同一性。技术人的中介性尽管也为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提供便利，但总的说来是越来越朝向代替人与人的关系的方向。有时，人类与技术人的关系，会质疑诸如友谊、爱情、家庭、民族以及国家等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带来相关价值观的令人惊愕的深刻变化，然而，一旦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竟也对已经变化了的事实习以为常。技术物对人类世界的改变，似乎比别的方面更能促使人接受。人类与技术人，并非两个平行的类群，人类在影响技术人，技术人也在强势地影响并且改变人类。技术的提升使人成为超人与非人，技术人正在成为人类的身体组织与器官，人类也正以某种方式成为技术人。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人类世，是技术人类世，而人类世是一个时间上高度压缩的人类纪，加速发展的技术正是技术人类世的动因。

人类社会似乎不得不驯服于技术物及其技术人，人类社会寄予技术太多的期待，但对于技术物对人类世界的决定性改变及其后果，在习惯于新的技术物形式时，却未必作出积极回应。然而，在人的同一性已经直接被技术人所破解，而技术物与技术人依然在生产出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时，显然必须保护人的同一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舍此无他。

六

当 AI 成为技术物时，技术物被赋予了确定性，并以此规范 AI 及其巨大的不确定性。西蒙东将不确定性赋予技术物，技术物是当时技术乐观主义语境下的电子管及其发展态势，而技术物也获得多样的存在方式，并被确认为技术个体。但技术物之为物，有其确定性，而机器以及“座架”即蕴含着如此确定性。技术物之为存在物，还应具有唯一性及其抽象性质，技术个体乃是“分有”技术物的结果，而技术个体仍是人类个体在场及其价值实现的表现。换句话说，人类个体仍支配着技术物及其技术个体，技术物仍是一种客体样式，机械控制下的自动化也还是被人支配的一套程序及流程，其中的不确定性还只是想象中的且可控制的不确定性。

AI 成为技术物，意味着将一种巨大的且常常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施加给了技术物，进而施加给人类，给人类带来窘迫与焦虑。令人窘迫与焦虑的，并不只是见之于通常看到的人类跟不上 AI 的状况，而是那些紧跟 AI 且深谙其理的技术学家在技术体验中的不安与焦虑。现实中带有巨大变数的不确定性，不等于想象中的不确定性。AI 化的自动化，已不同于机械控制下的依然是客体性的自动化，而是经常反客为主且以己为主，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AI 所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人类的想象力相形见绌。几十年以来，科幻艺术长盛不衰，不过，随着近年来 AI 的全面兴起，



科幻艺术似乎正在失去市场。科幻的想象说到底还是人的想象，其想象力竟然已跟不上 AI 式的想象。

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 AI 的不确定性已超出技术个化所设想的不确定性，并对人类活动构成威胁，那就有必要限制其对于人类同一性的可能僭越，包括通过 AI 发展立法推动 AI 技术的良性发展，以及对 AI 发展的限度立法，引导 AI 沿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技术个化有理由从属于技术社会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技术个化既不应与虚假的类型化的个人真实关联，也不应为各种离奇古怪的个性化背书，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说，基于不确定性并加速演化的技术个化，正与基于奇异性 (singularity) 而拓展开来的身份政治泛滥现象形成某种共谋，解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使技术社会陷入某种离散状态。基于当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及其对于社会的全面影响，已经不能再以不确定性来定义技术物，定义技术物的还是确定性，是超越某种仅仅在技术上规定确定性的文化确定性。此确定性基于人类生存及其文化系统的完整性及可持续性，即在任何意义上都使人能够驾驭人造物并且不滥用人造物。技术物的确定性根基是“一”，如果存在物重回到“一”，那就有理由将 AI 看成是“多”，正如 AI 作为技术人造物，仍然是技术文化的衍生物。确实有必要确立技术文化这一观念，这也是西蒙东的杰出贡献，但确立技术文化是为了使技术获得文化的理解，而不是以技术否定文化。AI 机器人，可以被看成是“技术人”。AI 技术社会的主体不是“技术物”，而是“技术人”。但是，AI 技术世界中仍必须区分人类与 AI 机器人，后者也还是“技术物”，而当“技术物”指涉机器时，其终究还是技术人造物。无论如何，技术物还是技术人造物。技术物甚至有可能被称为“第二自然”，但“第二自然”必然由“第一自然”支配并从属于“第一自然”，“第一自然”中的人类，不外乎是由自然历史生成并保护地球家园及人类文明的人类社会。“第一自然”也好，“第二自然”也好，都是在强调自然的本位及其正当性，而当 AI 成为技术物时，其也应有理由回到技术人造物本身。

七

在后人类以及新人类世的意义上讨论技术物，总不免陷入两歧：技术悲观论与技术乐观论，所谓技术现实主义其实也是技术乐观论之一种。大体说来，技术界人士总偏向于技术乐观论，而缺乏技术理解的人文学者偏向于技术悲观论，不断重复科技与人文关于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当年海德格尔以泰然的态度面对技术之天命，明确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西蒙东则提出技术物并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技术物；施蒂格勒则宣称：“人类不必再以人类中心论的名义来抵制技术。”^⑤今天的问题是，技术乐观主义正盲目占据着上风，而技术悲观主义则似乎失去对于技术世界人类生存的深层思考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人是否完全突破了技术物的界限，并且僭越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当年国际象棋人机大战，破除了人类智能胜于人工智能的迷信，而家用机器人的温情与适用性，也破除了机器人情商不高的前见。各种不同的大模型出现，使得人们认为，似乎科研这种高要求的智识活动也可以被 AI 所取代。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运用，更使人类同一性及其自我理解陷入焦虑，与此同时，技术增强论的引入，也使超人类主义浮出水面。

在论者看来，AI 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理解问题。人类学家尽可以观察 AI 时代人们的主动适应状况，以及智能机器人的人化过程，研究 AI 与人进行互动时的价值对齐。AI 技术社会的关键问题，还是对 AI 社会化的理解与认同，因为这事关人类同一性

这一根本问题。二是人类生活的个体化问题，包括情感多样化的表达问题。AI 总是能类型性地给出多种方案，而不可能因应于任何一个个体化方案。而如果 AI 能够量身定制地给每一位个体提供个体化方案时，人们突然会对什么是个体化产生怀疑。逃避技术支配是人的天性。是否能由 AI 系统解决技术个体化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前两个方面都涉及 AI 的社会建构问题，构建 AI 技术人是一回事，AI 技术如何建构社会系统，则是另一回事情，而且是天大的难事。西蒙东讲：“技术的专门化，也关系着技术物外部的东西（公共关系、商业形式），而不只是在技术物内部的功能图式（schémas de fonctionnement）。”^⑧技术物的呈现，本身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也是 AI 技术必然面临的问题。西蒙东本人虽止步于技术物的社会建构，但在 AI 时代此问题注定会不断凸显。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知识创造问题。即在既有知识已被 AI 征用的情况下，人类是否有能力创造和生产新的知识。因为 AI 在一般意义上已远超人类个体的知识能力，而且人类正在群体性地学习 AI 技术，这种情形很容易忽视人类创造和生产知识的能力。但只要 AI 依然靠数据、信息、资源等方式完成知识及其技术的更新，其就不可能取代人类的知识创造能力，也不可能改变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即形成的知识生产与创智传统。这极大程度地促使大学实现知识教育的更新并实现创造性发展。当下的大学形成了各式各样的 AI + 学科式的培养模式，对于突破学科林立及其壁垒，实现面向 AI 需要的学科集成与综合，十分必要。但某种带有自我保全性质的、面向 AI 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恐怕才刚刚起步，大学在实现知识自主创新以及知识生产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责任。^⑨

注释：

①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ohn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② 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Ninian Mellamphy trans., London, Ontario: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80. 注：鉴于国内已推出基于法文原著中文译本，下文引用参照许煜译：《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

③⑤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231页，第108页。

④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Sheila Faria Glaser tra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第192页。

⑦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吉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许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6页，第3页，第3页，第33页，第96页，第81页，第87页，第97页，第97页，第211页，第5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4页。

⑧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5.

⑪⑯ Gilbert Simondon, “Mentalité Technique,” *Revue philo-*

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vol. 131, no. 3, 2006, p.356, p.355.

⑭ 参见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⑲ 此处的“义具”对应术语 Apparatus，在斯蒂格勒的语境中，与义具相关联的词 *protheticite* 通常被译为“代具”，指向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器官外在化”。西蒙东则将其视为技术物中可以替换的、标准化的“零部件”，这种义具的重组是技术物保持开放与迭代的关键。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对“具身关系”的讨论，使用的核心词即是 Apparatus，该术语强调了技术物在人们感知世界时的中介作用。参见 Don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㉑ 本文系第7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面向技术社会的社会理论”（复旦大学，2025年9月）的会议论文。在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疑问：既然已有“智能社会”概念，为何要用“AI技术社会”？在作者看来，“智能社会”已成为一个指向社会治理的结构化和系统性的术语，管理学意味鲜明。但本文用“AI技术社会”，意在揭示以人工智能为技术物所建构的技术社会，是在已有的技术社会概念基础上讨论社会的智能化问题，是在AI问题域中展开的社会分析，意在分析AI作为技术物及其技术社会关系的变化状况。

编辑 张 蕾